



中国漫记

Zhong Guo Man Ji

海外中国报告

尼古拉·斯帕塔鲁/著

蒋本良 柳风运/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漫记 / (罗) 米列斯库著; 柳凤运, 蒋本良译.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7

(海外中国报告)

ISBN 7-5008-2263-4

I. 中… II. ①米… ②柳… ③蒋… III. 古代史 - 中国 - 明清时代 - 史料 IV. K2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977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9.625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重印题记

《中国漫记》中译本出版已经十年了。此书问世后，读书界反响不多，只在《北京日报》“最近我感兴趣的书”栏目中，看到读者“三言两语”的评议，誉此书堪称“中国古老文明的一幅才华卓绝的壁画”。现工人出版社王小平女士策划一套《海外中国报告》丛书，选人此书，使它得到再版的机会，作为译者的我们，深感欣慰。许多要向读者说明的，已在初版“译者的话”中说过，只是事隔十年，如今似乎又有一些话要说了。

—

70年代末，外子在罗马尼亚工作期间见到密涅瓦（Minerva）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中国漫记》（*Descrierea Chinei*），欣喜异常。

作者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是著名的罗马尼亚学者，以学识渊博著称，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并精通多种语言，一生著译甚丰。

《中国漫记》大致作于1677年，除了根据实地考察，作者还参考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许多书面和口头资料。由于内容涉猎甚广，所描绘的又是关于一个陌生的东方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成书过程势必要多次逾越语言障碍；1975年出版

的罗文版《中国漫记》，又是根据1910年喀山版古教会斯拉夫文译出的。翻译这样一部著作，确实会有不少困难。幸而当时已有多种可资参考的重要译作出版，对此书某些专有名词（包括古人名、古地名）翻译的准确性，大有帮助。

1982年，外子离任回国后，我们几乎利用了所有休息时间，投入了这项翻译工作。他搜集并查阅了所能找到的有关著译，译出初稿，我则对照原文校读译稿，边抄录边润色，便成二稿。有关中国的历史知识，我有幸就近请教文史学家刘叶秋（桐良）先生，后又得到中华书局资深编审谢方先生的帮助和指正。叶秋先生仙逝已十余载，亲切的指教，风趣的笑谈，恍如昨日，此书得到他的指点，避免了不少错误。当年谢方先生力荐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并在成书过程中作了具体审校，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二

外子的命运又一次与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联系在一起——那是在1992年，苏联解体，原加盟共和国摩尔达维亚独立，改称摩尔多瓦共和国，旋即与中国建交，外子成为第一个出使摩尔多瓦的使节。而斯帕塔鲁·米列斯库则是摩尔多瓦极受推崇的文化名人，他的铜像矗立在首都基希纳乌市中心普希金公园里，在众多文化巨匠中，排在最前面。

罗马尼亚曾由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摩尔多瓦三个公国组成，而米列斯库恰是摩尔多瓦人。摩尔多瓦是一个美丽而富庶的国家。16世纪拜占廷皇太子来到这里，也不由得赞叹，从未见过和听过“如此富饶”和如此“优美的习俗”的国土。优越的人文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至今仍使摩尔多瓦人民骄傲不已。

当外子告诉他们的文化官员，斯帕塔鲁·米列斯库的《中国漫记》已译成中文出版时，他们的惊喜是可以想见的。斯帕塔鲁是第一位出使中国的摩尔多瓦人（为俄国沙皇所派遣），而外子又是第一位出使摩尔多瓦的中国使节，可谓巧矣！对于《中国漫记》在中国翻译出版，摩尔多瓦视为摩中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当我使馆向摩尔多瓦国立图书馆赠送此书时，摩尔多瓦文化部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仪式，摩尔多瓦第一副总理、文化部长、教育部长等官方人士，以及驻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大使、美国大使和俄罗斯大使等都出席了仪式。一时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不断介绍，这一盛事在摩尔多瓦几乎家喻户晓。可惜我那时尚在国内，不曾恭逢其盛。

1993年7月开始，我在美丽的基希纳乌居留一年。我们居住的宾馆恰好在普希金公园近旁，早晚常漫步在浓荫遮蔽的公园小径上。外边虽是交通干道，可一步入公园，便立即隔绝了喧嚣。当漫步走过那一座座仅镌刻着生卒年月的铜像，仿佛走进了历史的隧道，那没有生平事迹介绍的铜像，早已活在一代又一代摩尔多瓦人民心中，仿佛任何介绍都是多余的。有时不经意还会发现，某个铜像前有几束鲜花，传示着人们的景仰和怀念。要知道此刻摩尔多瓦人民正经历着改革的剧痛，但依然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气氛，确实很使人感动。

当漫步在基希纳乌市浓荫密蔽的静谧街道上，那典雅的铸铁雕花护栏，环绕着米色古拙的“摩尔多瓦式”建筑，使我仿佛置身在一个文化灿烂的中世纪的公国，眼前是一片盛出诗人、戏剧家、艺术家和学者的沃土，在这里你随时都可以遇到热爱音乐、热爱戏剧、热爱美术、热爱舞蹈、热爱生活的真诚善良热情健谈的人们。普希金当年曾谪居此地，他那动人的长诗——《巴赫切萨拉伊宫的水泉》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也

许正是从这里获取了美妙的意境和灵感。

这是一个多雪而寒冷的冬天，豪华的管风琴音乐厅经常举办音乐会，暖气不足却丝毫不影响音乐家和听众的热情。那些坐在前排的孩子们，会情不自禁地轻轻地摇着脑袋，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当他们向演奏家或歌唱家献上一枝鲜花时，脸上绽现的羞涩而满足的笑容，至今仍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冬天，歌剧院上演世界上最长的（大约是没有剪辑过的）《费加罗的婚礼》，也许是对莫扎特的音乐难以割舍，也许是对歌唱家的表演爱得太深，几乎要演上四小时。我的邻居——一位美国领馆的女士告诉我，她没有闲暇的完整夜晚，只好每晚听一段，是花了几个晚上听完的。

就在我到达摩尔多瓦不久，在初秋的一个文化界的活动中，遇到几位热情的摩尔多瓦电影工作者，他们谈到要拍一部斯帕塔鲁出使中国的影片。主动要求扮演斯帕塔鲁的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演员，这是一位虽不年轻，但形象潇洒的摩国英俊男子，比照斯帕塔鲁的铜像，其形似神肖令人叫绝。只是众所周知，这个愿望在今天的摩尔多瓦很难实现。然而我相信，摩中两国人民总有一天会把它搬上银幕，这一天预示着摩尔多瓦人民已走出困境。这部影片将为世界人民揭开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必将受到所有热爱文化和文明的人的欢迎。

三

《中国漫记》一经问世，就有多种抄本流传。英国学者约·弗·巴德利（1854—1940）在《俄国·蒙古·中国》中指出，“此书惟一俄文刊本校订者 N.F. 卡塔诺夫先生就谈到有六种抄本，其中五种收藏在彼得格勒帝国公共图书馆，另一种为喀山城 M.P. 彼得罗夫斯基教授所有，再加上 F.T. 瓦西里耶夫所

藏并经他校订的一种抄本，共七种”。在本书的《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身世年表》中又提到，1685年，熟知斯帕塔鲁的瑞典学者斯帕尔文斐尔德，在莫斯科获得一部《中国漫记》手抄本。在17世纪的俄国，如果一书能有不下十个抄本流传就堪称名著，那么此书无疑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同时说明，17世纪的欧洲，无论是由于贸易还是其他需要，已经对中国发生了多么浓厚的兴趣！

巴德利在他的书中曾这样写着：

“从马可波罗时代以来，
那遥远的‘契丹’便萦回在我们心间。

“为了开辟航线通往‘遥远的契丹’，
英国人首先沿东北方向破冰前进，

“同一时期荷兰人曾三度冒险，
“绕过新地岛冰封的岬角”……

这里“契丹”指中国，这就是17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关注”。而斯帕塔鲁历尽艰辛，开辟了经过西伯利亚到中国的通路，并且撰写了《旅经西伯利亚日志》、《出使中国奏疏》和《中国漫记》。他对西伯利亚和中国长城以北地域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些著作，已使他俨然成为当时的中国学大家。关于这些报告的文学造诣，巴德利说，“俄国文学固然找不到一部作品堪与匹敌，就是在世界文学（中国本部除外）中，也难发现能相与媲美的著作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被埋没了两个世纪之久。

《中国漫记》直到1910年才在喀山问世，据说初版装帧之精美，堪与红衣主教希梅内斯的孔普留顿版希腊文《圣经》媲美，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地位。罗文版序言盛赞此书描绘中国文明才华卓绝，同时进一步指出，此书的成就“来源于作者对于时代的积极的、科学的、进步的观点”，这个论断大约是极为中肯的。

17世纪的欧洲，早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现代科学已在那里诞生，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已迫切需要扩张和开展对中国的贸易。斯帕塔鲁生于1636年，启蒙于雅西城，就学于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攻读神学、哲学、历史、文学，接着又到意大利，学习拉丁语、意大利语、自然科学和数学等。学成后曾任职宫廷，做过驻奥斯曼帝国使节，先后出使过瑞典和法国，后任职俄罗斯帝国外务省。良好的教育，丰富的经历，卓绝的写作才华，使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多种渠道考察了解，以鲜明的感受生动地描绘一个新奇的国家。斯帕塔鲁来到中国正值清朝鼎盛时期，他以欣羡的笔触描绘了这个古老帝国的灿烂文明，这是与欧洲明显不同的文明；从他的观察中也使人感受到中国的保守和自大，在现代科学、现代军事方面已远远落后于欧洲，欧洲的坚船利炮已经出没于我们的海域……书中所有的描述，虽然远在几百年前，却仍然会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学者们早已指出，人类的文明首先在中国、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尼罗河流域，从蒙昧中诞生。而横贯中亚、绵延七千余公里的丝绸古路，艰难地沟通着欧亚以及北非的古老文明。每当丝绸之路通畅安全，过往的商旅、僧人、使节频繁，都带来了文明的交融和巨大进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无言地证实了这一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说，“再没有比那三项对古人来说一无所知的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更为引人注目的了。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第一项之于文献，第二项之于战争，第三项之于航海，随之而来的是无以数计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类活动中，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都不如这些机械的发现更具有力量，更具有影响。”这正是中国的古老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都曾达到世界无与伦比的高度，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珍惜和骄傲。

然而，当欧洲度过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时，我们的文明似乎也随着丝绸之路的落寞面逐渐式微，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沉思，在文明的起落处驻足沉思……发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他国他民族的文明精粹，这是我们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尽管人类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然而还有无比遥远的道路要走；尽管社会和文明已经达到惊人的高度，然而社会和文明依然年轻。今天，人类仍然要进步，要发展，而且仍然会有许多史芬克之谜需要我们去解答，去发现！

柳风运

1999年9月

序

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赴北京途中刚抵达脑温^①，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猝亡^②，引起俄国统治阶层的一系列更迭，也给米列斯库的回程增添了不少意外，使他备受艰辛与周折。

不过，米列斯库是在1676年11月在回国途中到达色楞格斯克后，才得知莫斯科发生突变消息的。也许由于降冬降临，这位使节有意在此多作耽搁，一方面静观莫斯科政局的演变，同时乘机撰写他的出使报告，以向新沙皇的僚属述职。也可能由于道路堵塞，米列斯库直到1677年6月7日在叶尼塞斯克才获悉阿列克谢沙皇去世和马特维耶夫被贬^③。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富于政治阅历的使节立即意识到，他在外务署^④的地位是削弱了，需经一番新的搏斗始能复原。

米列斯库于1677年7月9日离开叶尼塞斯克，7月20日开始回国旅程的第二阶段，即由水路从马科夫斯克寨到托搏尔斯克^⑤。

① 今齐齐哈尔。——译者注

② 1676年1月29日。

③ 参阅《旅华日志》1958年E、S、P、L、A。（国家文艺出版社）第二版，第319页。此论据可参看《旅华日志》前言，也可参阅“大众图书”版第156期，1962年。

④ 当时莫斯科主管对外关系的机构。

⑤ 参阅《旅华日志》，第319页。

莫斯科的某些新贵们想打击阿列克谢沙皇前宠臣手下的佼佼者——米列斯库，根据这些人的训谕，叶尼塞斯克的总督，在米列斯库走后，对他在中国时的表现作了追查，以在米列斯库抵达莫斯科之前，就把他出使的情况先期报告外务署长官。提供情况者，自然也有米洛瓦诺夫^①。或出于忌妒，或出于投机，他^②于1677年8月9日书面控告米列斯库作为首席使节^③滥用职权，无视礼节，践踏训谕。

这些情况，米列斯库直至9月25日抵达托博尔斯克后才得悉。米列斯库在托博尔斯克被扣留到12月1日，才被获准回返莫斯科，并于1678年1月5日抵达这里^④。

但米洛瓦诺夫的控告无损大局，因米列斯库仍获准返回了莫斯科，在托博尔斯克也没有像尤里·克里让尼奇^⑤所遭遇的那样被软禁。尽管如此，一旦抵达，按出使规定，米列斯库即去呈递《官方文件》^⑥（大概是《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边界西伯利亚纪行》^⑦）时，外务署新的官员迎接他的是怀疑和审慎。

虽然米列斯库还在托博尔斯克等候沙皇钦准回返首都时，

① 一个崭露头角的哥萨克人，涅尔琴斯克总督阿尔申斯基曾派他出使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后于1676年，因通晓去中国的道路，也参加了米列斯库率领的使团（参阅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伦敦，第二卷，第九章，第195页）。

② 参阅《旅华日志》第19页。

③ 参阅巴德利：前引书日，第二卷第442页。

④ 米列斯库出使中国往返时，在莫斯科到马科夫斯克这段路程，用的是同样的交通工具，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而且均为夏天。对照来去旅程所花的时间，并根据《旅华日志》记载的材料，即可推算出这里所列举的时间表。1675年，米列斯库从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走了27天，从托博尔斯克到马科夫斯克走了65天。回来时，从马科夫斯克到莫斯科走了166天。减掉去中国时在这两点之间旅程实际花的大约98天，剩下的60天就是在头一个大城市托博尔斯克被当局扣留的时间。

⑤ 参阅《旅华日志》第33页。

⑥ 《官方文件》是所有俄国使节自越过国界之时起，必须写的逐日报告，内容是完成使命和谈话情况。1906年由尤里·阿尔谢尼耶夫发表于彼得堡。

⑦ 尤里·阿尔谢尼耶夫发表：《俄国使节斯帕法里（即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译者注）1675年西伯利亚纪行，从托博尔斯克到涅尔琴斯克和中国国界》，1882年，彼得堡；接着又发表《俄国使节斯帕法里1676年从涅尔琴斯克至北京纪行》，1896年，奥伦堡。

已拟就《中国漫记》初稿，因为书尾具明日期为 7186 年^① 11 月 13 日，但可以推测，米列斯库并未立即交出书稿。我们认为，米列斯库不堪世态之炎凉，力图冲破自他返回莫斯科之后旧友冷漠的氛围，他又对此书精雕细刻，扩充了篇幅。《漫记》所举某些日期也可证实我们这个推测。对这些日期，以后我们还要讨论。显然，在托博尔斯克等候莫斯科外务署的训令期间，米列斯库曾与这里的旧友攀今道故，聚首往事。这里的朋友比叶尼塞斯克的朋友^② 更为真诚，对米列斯库十分同情，可能也给他补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当时托博尔斯克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商业城镇^③，每年都有许多中国商人、鞑靼商人和布哈拉商人到这里来赶集，从这些人的嘴里可以听到不少关于中国的情况。

米列斯库遣使中国并非仅仅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仅为远东边民纠纷而采取的孤立行动。通古斯人^④首领根特木尔偕全家出逃涅尔琴斯克，中国人感到这有损于他们在蒙古纳贡人中间的威望，执意要求引渡；中国大清时代军事实力的增长，对蒙古北部俄国纳贡者执行侵略政策，这些都不可能是决定派遣以米列斯库为首的重要使团的原因。然而，所有这些皆可用来当作外交上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采取这项行动是由封建俄国国内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17 世纪初叶，俄国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纪。1675

① 即公元 1677 年。

② 这是指贵族普里克隆斯基，他在新的权贵手下当上了涅尔琴斯克总督。米列斯库头一次到达该城时，凭着马特维耶夫的进荐，普里克隆斯基接待十分殷切。但随着纳雷什金家族的倒台，当米列斯库返回时，在这里却受尽了侮辱，遭到严厉盘查，没收了私人财物，登记了所有文件（参看《旅华日志》第 34 页，并对照第 319 页）。

③ 参看 A. A. 诺沃塞爾斯科和 I. V. 烏斯季烏哥夫：《苏联历史研究》，第 17 世纪，1953 年，莫斯科，第 548 页。

④ 即鄂伦春人。——译者注

年米列斯库出使中国是在他以前的一系列规模较小的类似行动的自然延伸，其目的首先在于保证顺利开展与别国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受到波罗的海和黑海政治经济集团的阻碍。同年，还曾派遣以科西摩夫为首的使团去晋谒蒙古大公奥伦扎布(Aurengzebu)，以求建立与波斯和印度的贸易关系^①。

这些出使活动旨在与亚洲各国建立正常的法制、经济和政治关系^②，因为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只剩下阿尔汗格尔斯克港这一条渠道了。在这里进行的交易占整个俄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虽来往于此的船只逐年增加^③，但商品销售仍然有限。随着商业活动的开拓，国家的年收入不断增加。然而，俄国政治经济日益迅速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需求，耗资甚巨，尤其迫于这样的形势：波斯商人和土耳其商人在中亚细亚和高加索的竞争愈演愈烈，因此俄国不得不尽力开拓对外经济联系。

从米列斯库临行前接受的训谕来看^④，根据俄国当时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他出使的任务有三：

一、全面考察乌拉尔以东西伯利亚的俄国疆土，关于这些地区，流传着许多怪诞臆测之说；

^① A.A. 诺沃塞尔斯克，上举书目，第543页。

^② 出使波斯的有：(1600年)霍赫洛夫、扎塞金、萨罗波夫；(1613年)吉洪诺夫和布哈洛夫；(1614年)布列霍夫和阿法纳西耶夫；(1615年)萨赫马托夫；(1618年)巴里亚京斯基；(1623年)科托夫；(1646年)科兹洛夫斯基；(1653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出使高加索的有：(1604年)塔吉谢夫；(1614年)布列霍夫；(1615年)萨赫马托夫；(1618年)巴里亚京斯基和奇切林；(1623年)科托夫；(1637年)伏尔科夫斯基(1639年)埃列美；(1641年)莫谢茨基；(1650年)多尔恰诺夫。出使远东西伯利亚、喀尔木克人和蒙古人等：(1614年)库洛奇金；(1627年)佩菲利耶夫；(1636年)雷布洛夫；(1639年)布扎和伊凡诺夫；(1642年)艾拉斯托夫兄弟；(1641年和1647年)斯塔杜辛；(1645年)贝里安；(1649年)莫斯科维京；(1648年)阿历克塞耶夫；(1643年)波雅尔科夫；(1647年)哈巴洛夫；(1652年)涅吉里亚。出使中国的有：(1618年)佩特林；(1654年)巴伊科夫。(根据D.M. 列别捷夫：《17世纪俄国地理》1949年，莫斯科)

^③ 从1618年的20—30艘，增加到1670年的80—100艘。参看诺沃塞尔斯科所著上引书目，第129页及以下

^④ 参看《旅华日志》第4—5页。

二、尽力与远东建立商业和外交联系，避免波罗的海和黑海封锁的影响；

三、了解中国经济、政治、行政、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实情。

《旅华日志》中关于西伯利亚旅程的记述，适应了第一项任务的要求，详细介绍了西伯利亚的地理、经济和人文资料；而《官方文件》，也就是米列斯库出使活动的正式报告，适应了第二项任务的要求。

《中国漫记》正是第三项任务的成果，也是这位使节的特殊使命，即尽量完整、准确而多方面地了解中华帝国和中国人民，因欧洲流传着各种关于中国的神奇传说，而又所知甚微。从米列斯库的《旅华日志》可见，17世纪的中国，外人很难进入其内，且一旦跨入，即被处处监视，步步限制。诚然，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中记述了许多这个遥远国度的一些饶有兴味的故事，但往往偏重于教会事务，且不乏泛泛之词^①，以免引起中国当局的怀疑，从而为其传教活动设置障碍^②。因此，那个时代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米列斯库完成使命而结出的硕果，意义尤为重要。

根据《旅华日志》，从这位莫尔多瓦人在中国的处境来看，似乎他的外交使命是不成功的，仅仅因为一个礼节形式问题而未能与中国人达成协议。可是，在阅读《中国漫记》之后可以懂得，米列斯库在进入中国国界，尤其抵达北京之后，拖延谈

^① 如金尼阁（《中华帝国介绍》，里昂，1635年），鲁德昭（《中国通史》，里昂，1667年），柯且尔（Ath.Kircher）（《中国名胜……图片》，阿姆斯特罗丹米，1667年），卫匡国（《鞑靼战纪》，安特卫普，1654年）。

^② 一次南怀仁“要使节在神像面前起誓，不将所闻之事告诉任何人，也不要笔录下来，直到离开中国国界为止。因为他们（耶稣会士）作为异国人，为了基督备受艰辛，甚至遭到怀疑……”（《旅华日志》，第169页）。

判，耽搁各项官方使命的时日，均属故意，以图延长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这就是中国侍郎官马喇之所以怒不可遏地严斥俄国使节，“我想沙皇是精心挑选你来同我们这些不善辞令、只会直言不讳的人^①进行谈判的”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催促俄国沙皇使节及其随从尽快离开北京并拒绝以任何藉口延期启程的真正原因。但这时，米列斯库已巧妙地延长在北京的停留时间达三个半月之久，以完成训谕中交付的使命。一再拖延耽搁引起朝廷官宦的疑心，因此，1676年8月29日，当米列斯库进宫接受临别赠礼见到南怀仁时，这位耶稣会士悄声对他说，不能再同他说话了，“因为有人已向尚书和侍郎告密，说我把所有国家机密都出卖给使节了”^②。

米列斯库9月1日的记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看来我如果再不准备上路，他们就可能使用强力将我赶走。因此，我要侍郎立即给我派遣车辆，我将尽力而为，无论有多大困难，也一定要走。”^③

《中国漫记》是米列斯库忠实而出色地完成使命的一项积极成果，“为了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全面昌盛和荣耀”^④。

米列斯库此书是俄国文学中全面介绍当时对人们如此陌生的中国的第一部著作^⑤，与那个时代世界文学中同类主题的著作相比，它更显完善^⑥。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人种学材料，其论述反映了这位莫尔多瓦人的深刻思想及进步的历史学观点。这些观点，作者在《中国漫记》成书后不久所撰写的《俄罗斯

① 《旅华日志》，第181页。侍郎为当时中国处理洋务的官员。

② 《旅华日志》，第291页。

③ 参看《旅华日志》第304页。

④ 《中国漫记》的结束语。（参看《旅华日志》）

⑤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49卷，第253页。

⑥ 参看巴德利，上引书目，第211页，说米列斯库提供了一些极其重要的资料。

《皇帝史传序言》中作了表述。

就作者所处的时代而言，《中国漫记》可称为专题著作的典范。书中历史、地理、行政统计资料与物质文化情况交汇融合，再与经济状况密切联系，并顺其自然地谈到了社会机构，思想意识、民间艺术、传统习俗、神话传说、中国人的性格与职业等等。

本书共有五十八章，分为均衡的两大部分，虽篇幅并不相等。

头一部分包括二十章，正如米列斯库在第二十章结尾说的，这部分叙述了“中国人的公众事务、帝国情况和风俗习惯，以及一般介绍所涉及的其他情况”，其次序如下：历史（第一、二、三章）、地理和经济（第四、五、七、十六章）、外交和政治（第六、九、十、十八章）、军事（第二十章）、人种学（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和十九章）。

第二部分“对所有十五个省分别作了专门描述，介绍了这些省的省会和较小的城市、河流山川、自然资源、物产种类”。这部分包括三十八章，其中最后两章介绍了朝鲜和日本。这些简短的描述，大体上沿袭了本书头一部分的结构和格局，因此可以说对每个省都作了一篇专题论著，这些论著把头二十章里论述的主题地方化了。

本书写作风格十分严谨，表现了米列斯库对中国人民的赞赏和仰慕。米列斯库的仰慕之情既来源于在嫩江边和在北京作长时间停留期间的个人观察和阅读介绍当时中国的著作之所得，也来源于直接交谈。他客观地观察了中国人民勤劳、富有才智、谦虚、诚实，特别是崇尚文化的品质，并在作品中作了充分的反映。当时西伯利亚东部边界的哥萨克战士经常同强悍

骁勇的独立蒙古游牧部落交往。米列斯库有时受这些人讲述的故事和他们的看法的影响，嘲讽中国大汗的士兵涣散而无斗志，说他们“勇如妇孺，怯如走兔”。但是他的赞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在嘲讽时仍然认为，这些现象起源于他们爱好和平的本性，“他们不尚武事，他们擅农、经商和其他职业”。因此，他们虽然武器精良，“弓马娴熟”，并有“自古发明的铁制火炮”，但不懂军事艺术，因为他们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不好武事，也不提倡武事，习武被视为不光彩的事”，“舞枪弄棒和从事战争均被视为盗贼行径，而非正人君子之所为；凡正人君子均应和睦相处，谦恭相待，械斗和战争类乎禽兽”。

当然，由于接触而窄，仅限于能出人使团在北京驻地庭院的那些人，米列斯库的观察和判断难免有谬误之处。有时他的结论来源于一些宫廷达官贵人、他们的奴仆和他们推荐的商贾，而这些商人要尽手腕，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巧取豪夺。因此，米列斯库使用了“奸诈、虚伪、诡谲、狡黠、不仁不义”等形容词。联系到《旅华日志》中记述的在北京进行外交谈判的情况，这就更不难理解了。但是，一旦笔触言及整个中国人民，赞叹之词便油然而生：（中国人）“惯于无休止地艰苦劳动……体形轻巧，习于徒步行走，衣着厚实；夏日赤膊，在炎日下也不戴帽子。在田野、城镇，劳动之艰苦无法形容。他们天赋健康的体质，自幼习于劳动，所以很少见到疾病患者、体质孱弱者和乞丐。”

田野“处处精耕细作，阡陌纵横，田埂交错，中国的耕作技艺举世无双……中国之于世界，犹如指环上镶嵌的宝石”，因为，“即使荒漠沙滩，中国人也能以他们的技艺将其变为良田”。

米列斯库著作的价值在于传给我们广博的关于中国的知